



北宋张择端版《清明上河图》(局部)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长5.28米的长卷风俗画,绘制了北宋都城东京(也称汴京,今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作为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首,我能够对其进行两次临摹还原,实感荣幸之至。在这两次临摹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简单认知到深刻领悟的蜕变,这使我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这一理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我作为亲历者、实践者,有太多的话想讲。

旷世之作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需要对一些普遍存在的误解和错误认知进行说明。实际上,《清明上河图》这幅画背后隐藏着许多的未解之谜,与其说它是“十大传世名画”之首,不如更准确地称之为中国传世神秘画之首。在中国甚至世界美术史中,它都是当之无愧的谜团最多、疑惑最多,也是最具有神秘感的传世名画之一。目前,我们对它的认知和理解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

首要问题便是:哪一幅《清明上河图》才是真正出自北宋张择端之手?或许有人会有疑问,难道还存在非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或者张择端创作了不止一幅《清明上河图》?

据专家统计,自北宋张择端创作了这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清明上河图》后,以“清明上河”为题材的长卷画作,至今留存下来的版本至少有170多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版本有三个。首先是北宋张择端的版本,也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主角;其次是明代仇英所绘的版本,该版本代表了明代苏州地区在此类题材上的最高艺术水准,对后世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最后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画师陈枚、孙祜等五人合作的版本,它展现了清代宫廷画家在表现此类题材上的卓越艺术成就。通过仔细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版本的作者在创作理念、艺术基调和价值取向存在显著差异。张择端的版本意境淡雅、质朴敦厚;仇英的版本异彩纷呈、艳丽夺目;而清院本则浓墨重彩、机械呆板。在此,我们不对这三幅作品进行过多的比较和评价,我们专注于北宋张择端版的《清明上河图》。

201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推出“石渠宝笈特展”,张择端版《清明上河图》真迹公开展出。消息传开,观者如潮。在为期一个月的展览期间,从武英殿到太和殿广场,观展的队伍排了将近1000米,不少观众排队多达10个小时,才能如愿以偿观赏几分钟。每天清晨午门一开,就会出现数百人奔跑着冲向武英殿展馆的盛大场面,这一现象被媒体称为“故宫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声称:“为《清明上河图》排队,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文化风景。”今天我们可以欣赏到各种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也可以说是一道美丽的文化风景。

当“故宫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为人们津津乐道后,《清明上河图》这一艺术瑰宝也随之再一次走进大众视野,并受到广泛关注。然而,所有观展者期待已久、不惜排队几个小时观看几分钟的《清明上河图》真的是近1000年以来北宋张择端亲笔所绘的那幅《清明上河图》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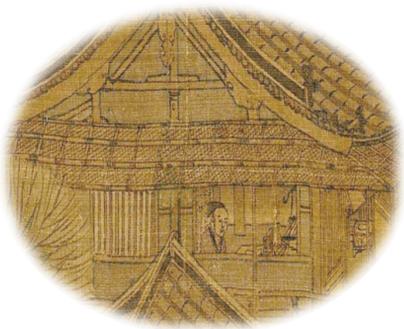
是!也不是!仔细观看这幅传世名作就会发现,原作只有一部分着色,难道张择端当初画的就是半幅成品吗?抑或是粗心大意只上了一半色?还是张择端的原作压根就是一幅墨笔画,一幅本就不准备上色的素色长卷?那就让我告诉大家这一切吧!

创作历程

本世纪初,我来到北京创业,最初是从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由于职业关系,逐渐对美术产生了兴趣。开始的时候,主攻西洋建筑和油画,尤其喜爱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认为他们的艺术水平已经登峰造极。2016年前后,我开始向国画转行。就在这个时候,我有幸结识了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长阎振堂先生。身居要职的阎老先生常怀远虑,对《清明上河图》的命运非常担忧。众所周知,名画的保存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即使再好的修复、揭裱,也无法保证它永久流传。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展出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因此临摹还原便成为了让文物继续流传的最佳方式。个别精致的临摹还原作品甚至可以被称为“第二文物”。我就是在阎振堂先生的建议和鼓励下,开始了漫长的还原《清明上河图》工作。由最初的还原原作到最终自发地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我经历了

还原传世名画 坚定文化自信

梁秀巍



《清明上河图》中疑似为张择端本人自画像的部分

理解张择端的内心世界显得尤为关键。为此,我尝试通过时空对话的方式,探寻他的创作灵感与情感表达。这段探索之旅对我而言,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神奇与启示。

我从没有如此迫切地想要了解一个人,了解一位和我相隔近1000年的古代画家,想方设法地了解关于他的成长环境、他的审美、他的思想。因为我知道,所有的答案,一定隐藏在他的思想和灵魂里面,表现在他作品里面,甚至隐藏在他的名字里面。

首先,他的名字给了我一把解读他的钥匙。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后有金人张著跋文:“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这是史料中关于张择端唯一的记载。考其名、察其字、索其地,“择端”出自《孟子·离娄下》:“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正道”出自《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东武,鲁古地名,隋开皇十八年(598)改东武为诸城,沿用至今。生于儒家发源地的张择端及其父辈,与生俱来思想和血液里都浸透了儒家的思想和美学,交友择端,学道取正,顺理成章,孔子提出的“绘事后素”的审美思想想必也影响了他。

《论语·八佾》中有一条,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何为兮。”子曰:“绘事后素。”朱熹集注:“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又注:“素,粉也,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南怀瑾《论语别裁》对此加以解释:绘画完成以后才显出素色的可贵。对于张择端而言,虽为宫廷画师,但他也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民众的生活。因此,他作品的底色不应该是充满艳俗和烟火气味的浓墨重彩。

然而,当我再次打开《清明上河图》原作仔细观察时,却发现画面上充满了各种颜色,许多局部着色处略显突兀,有刻意敷色之嫌,总不及全部墨笔更具神韵。随后下载原作高清图,经图像处理为纯灰色后,文人画审美意趣跃然而出。尤其是卷首所绘枯树、河滩及坡石等,欧阳修《鉴画》所谓“萧条淡泊”之意及“闲和严静、趣远”之境更加淋漓尽致。一个大胆的猜想油然而生,张择端为什么要为画作上色?这跟他的美学思想“绘事后素”是有冲突的,有没有一种可能,张择端当时就是素墨完成此作的?

之后不久,我与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主任余辉先生结缘,余辉先生观摩了我的画作。我便将原作可能为素色这一大胆的猜想讲给余辉先生听,余辉先生非常兴奋地告诉我,原画就是素色墨笔。至此,长时间困扰着我、让我苦苦追寻的结论终于得到了印证,我与余辉先生在《清明上河图》原作应该是素色这一观点上不谋而合。所不同的是:余辉先生在其恩师薄松年先生的指引下做了考证;而我则是在反复临绘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发现的。

据余先生讲述,薄松年先生曾在明代孙鑛著《书画跋跋》中看到关于《清明上河图》卷有“初落墨相家,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的记载。

明嘉靖末年,严嵩父子被废黜抄家,《清明上河图》入内府。次年世宗崩崩,穆宗登基,因不喜欢《清明上河图》的墨笔风格,便敕令宫廷画师为画染色,宫廷画师染色一半后觉得不如素色淡雅,穆宗亦有同感,急令停工。于是后世所能看到的《清明上河图》卷中,可见多处人物衣物与物品等细节尚未上色,仅以白描手法勾勒轮廓,而部分区域则敷有色彩,整体呈现出一种半成品的状态。

而我的还原本所呈现的,正好就是余先生一直想看到的原画当时素色墨稿的风采。随后余先生为我的画题跋,其中有言:“梁秀巍临作线条生动,浓淡相宜。无工匠雕琢之俗气,有自然清新之雅风……较原作更醒目……余于其室见此卷尚未着色,即嘱其守素。盖原作为墨笔。明孙鑛《书画跋跋》有明穆宗令宫廷画师为

此画着色之记载……后人临者更有以浓墨重彩现之,甚失原作笔墨素雅之气。今观秀巍之作,如睹张择端之原本……”这就是“梁秀巍还原版《清明上河图》”的来历。

我的发现之旅虽充满了疑惑甚至苦闷,但苦思不得后一朝豁然快乐,也只有作为亲历者才能体会。其背后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严谨缜密的推断考证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疑惑涌现

在我两次通临《清明上河图》期间,好多疑惑不断涌现,有的随着阅读相关著作已逐一解开,但仍有许多疑惑和新的发现。

一、画幅前后笔法不同。我个人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张择端边学画边创作,这更体现了他的超人之处;另一种可能是《清明上河图》是由一个团队集体完成的。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中有记载郭忠恕让王士元补画一事:“而忠恕于人物,不深留意,往往自为屋木,假士元为人物于中,以成全美。”同书又记载师法于卫贤的何遇:“善画宫室池阁……其间人物则假手于人。”描绘如此丰富多彩的画面,精心刻画众多的人物及建筑物,仅凭一人之力确实难以驾驭。

二、孙羊店前大胡子为说书者,不太可靠。从外貌上看,大胡子有《风尘三侠》中虬髯客的影子,不像是满腹经纶的说书人,更像是江湖人士突遭事故,甚至有杨志卖刀砍人后被围观的相似情节。《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中记载:“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由此推断,说书者及听众,应该是在棚下进行,说书者或席地而坐或手执道具。倒是画中再往右临近河流处地上坐着的卖药老人,更像是边卖药边说书;而每场说书起码要一两个时辰,长时间围在孙羊店门口,严重影响孙羊店生意,人家也肯定不会同意的。

三、卷中有一书生独坐阁楼,冥思苦想,似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结合我对张择端心境的揣摩,疑为张择端的自画像。从构图、画中人姿势与面相解读:居于解命店(画中人的左侧绘制了一群书生围着一位老者解命,并刻意挂着解命招牌)旁而不解命,同为书生模样,却不同流合污,不信命运安排。可以想象张择端性格特立独行,甚至有点桀骜不驯。纵观全世界好多名画,将自己巧妙地隐藏在画中某个角落的现象非常多,如张大千的《文会图》、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伦勃朗的《夜巡》等。

四、通过近两年的实践,我认为张择端要完成《清明上河图》,从构思到封笔,需要在艺术上解决如何表现宏大的场景、精致的界画和微小的人物等技法以及诸多画科难题,全部完工,至少需要四五年,而有的学者认为两三年便能完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大部分人都知道,虹桥一段是全画的主体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但从作画的角度讲,难度最大的是从右向左进入河流部分的三船相叠及虹桥左侧的牌楼木架。

六、通过通临时对各种物件大小错综交叠关系的仔细分析,此画应该从左右向绘制的,最左边上下两三株树几乎重叠,从构图上讲,可视作封笔之意。从而可以推测,《清明上河图》是完整的。

心得体会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的集大成者。在临绘过程中,既能学到宏观把握广阔场景和精细刻画具体情节的技巧,又能融会贯通多种画科的技艺(界画、白描、水墨、渲染、皴擦等)和各种实物的写实能力(街道、舟桥、寒林、坡石、流水、牲口、人物等),而这些还仅仅是一个擅长展示宏大场景画家的基本要素。如何将广泛博取的艺术门类进行组合,将前人各类画科之所长有选择地呈现于画布之上,在此基础上还能有所创新,糅入清雅蕴藉的文人气息,避免堕入俗匠之趣,这才是最大的收获。在此也建议广大美术爱好者,可以完整临摹一遍《清明上河图》,确实受益匪浅,其乐无穷。

古今中外名画浩如烟海,至今尚未有一幅作品能够像《清明上河图》那样,持续引发如此

众多竞相效仿与摹制的高潮。临本、摹本、仿本、抚本、异本、别本,甚至伪本、贋本层出不穷。这些版本虽不能与真迹相提并论,却因为记录下了各自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成了“稀世珍品”,甚至是“无价之宝”。戴立强先生在《〈清明上河图〉异本考述》一文中指出:“传世或文献记载的《清明上河图》异本之多,无任何一件古代绘画可比拟,堪称‘千年奇画’。”《清明上河图》不同版本的不断出现,明显带有所处时代的深刻印记,它们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脉的形象代言,更是几千年文脉生生不息的象征。这样一个自带无限光环的大IP,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被不断彰显、推广和普及,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便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等,都没有留下那么多的同一题材的各种版本,并流散到世界各地。这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作为中国人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走向世界,《清明上河图》也必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文化财富、最耀眼的文化精品。生为中国人,我们感到骄傲,作为亲历者,我更感到无比自豪。

此时此刻再回头凝视《清明上河图》,仔细分析它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包括它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会不由自主地增强我们当代人的文化自信。它所散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尊老爱幼的特质,不正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么?《清明上河图》犹如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画中800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共同编织着无数种的可能性和动人故事,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式故事的生动载体和历史物证,更是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件传世珍品。对这幅画持续、深入地挖掘,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我是非常幸运的,凭一支毛笔,更凭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还原了与张择端真迹一样“真实”的21世纪版《清明上河图》,以另类的形式,尝试着对这一伟大的传世名画进行传承式保护,并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可。保护和还原历史遗产就是在保存一段真实的历史,文化遗产意识是一种历史意识。目前我们正处在新的历史时代,自觉、自发地坚定并强化历史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三年来默默无闻地还原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我积极参与中华文脉的赓续、坚定文化自信的见证,也是一张对我来说非常满意的答卷。

讲座地点:最高人民法院
主讲人:梁秀巍
时间:2023年9月3日



梁秀巍,1974年4月生于山西文水。早期从事建筑设计。曾于北京奥运会期间为王府井大街设计“四大发明”钢结构巨型城市雕塑,并被中央电视台报道。2017年前后转型从事中国书画研究,目前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2019年始,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首——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耗时近三年,揭秘了原作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并两次绘制,最终呈现出张择端原作北宋时期的原貌,被故宫博物院定名为“梁秀巍还原版《清明上河图》”。